

朱子南 著

来自作家生活的 文学报告



◆ 苏州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苏州大学“211 工程”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来自作家生活的文学报告

朱子南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作家生活的文学报告 / 朱子南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 5

本书由苏州大学“211 工程”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ISBN 978-7-81137-692-0

I. ①来… II. ①朱…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1310 号



来自作家生活的文学报告

著

朱子南

责任编辑

盛 莉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 180 号 邮编 226300)

开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28.5 **字数** 477 千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1137-692-0

定价 50.00 元

李若冰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

(代序)

子南同志:你好!

.....

你对报告文学作家的研究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和别的评论家不同。特别是你联系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经历来写,读起来十分亲切。读者从你的报告中,不仅对报告文学作家的艺术成就有所了解,而且透过他们的生活而对其艺术的追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认为这是文艺评论的一种创新,一种更加生动和谐的创新。我对你的这种形式非常赞赏!读那些刻板说教式的评论文章是件苦差使,我是很少看那些东西的,除非因某种需要才看。读你的“报告”就不同了,你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形象从各个角度加以描绘,实际上是既评论了作品,又把作家的形象树立起来了。这是一种很巧妙的评论样式。

.....

此致

敬礼

李若冰



目 录

风雨人生	
——记“五四”作家陈学昭	1
一个圈儿,又一个圈儿……	
——记萧乾	12
黄钢的传奇人生	28
重铸魂魄	
——记钱钢	37
“柴达木! 柴达木!”	
——记李若冰	60
依然追寻,依然追寻……	
——记柯岩	78
梦	
——记李玲修	100
徜徉在刚柔世界	
——记罗达成	114
强行起飞	
——记陈冠柏	131
庞瑞垠和他的“之死”	150
呵,青青的爬山虎	
——记肖复兴	181
潇洒人生	
——访黄铁男	197





但求无愧我心	
——记贾鲁生	216
铸情	
——访黄宗英	230
“作品创作了我”	
——记陈祖芬	241
心灵的奉献	
——记孟晓云	253
要写出那心灵的蓝天……	
——记理由	266
猫和狗的故事	
——记胡平、张胜友	280
真诚的轨迹	
——记谢大光	296
一手抓“钱”，一手抓“权”	
——谢德辉：从一个“反革命”逃犯的经历看那个世界	310
选择悲壮	
——记张嵩山	342
胸口有“三扇门”的文史大家宋云彬	366
附：对宋云彬日记的一些解读	375
“图王”“称霸”	
——记明清诗文专家钱仲联	380
几度春满爱莲堂	
——忆周瘦鹃	397
这“猴性”	
——记陆文夫	408
追求	
——再记陆文夫	429
后记	447



风雨人生

——记“五四”作家陈学昭

丁玲在1982年第3期《文艺报》上有一篇题为《五代同堂,振兴中华》的文章,概述了自“五四”前后以来我国五代作家为呼唤民主、自由,呼唤人类的良知,奋力在文艺领域里所作出的贡献。丁玲认为,自1919年至1927年,也即“五四”前后到大革命时期,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坛的第一代作家,鲁迅是他们最伟大的代表。“在这一代人中,现在仍然健在并且继续写作的还有叶绍钧(叶圣陶)、谢冰心、萧三、蹇先艾、陈学昭等人。”时至今日,这一代作家都已先后去世了。

陈学昭作为我国现代第一代作家,是当之无愧的:早在1924年1月1日,她就在上海《时报》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作品。1925年,时年19岁的陈学昭,在上海梁溪书店出版了散文集《倦旅》,之后曾印行了数版,可见她的作品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1927年,她又出版了散文集《烟霞伴侣》《寸草心》。终其一生,陈学昭在文学领域里辛勤耕耘了六十余年。

1906年,陈学昭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州城,即今海宁市盐官镇。她的祖父陈楚珩,在一家丝行工作,却喜欢昆曲、藏书,有“陈昆腔”之美誉。父亲陈典常,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陈学昭在小学时就读了《史记》《昭明文选》等。她因特别喜爱《昭明文选》,故于写作投稿时,采用“学昭”的署名,她本名“淑章”慢慢淡化了,并最终被“学昭”取代。她13岁时,开始受五四运动倡导的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影响;于1922年16岁时参加了新文学运动中建立最早的浅草文学社团。她撰写的《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获得《时报》征文乙等奖。该报主笔戈公振是她遇见的第一位对她扶持、奖掖有加之人。之后,她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勤奋的写作立足于社会,与许多名家建立了联系,特别受到鲁迅的器重,并成为鲁迅家的常客。

陈学昭的人生之路,开端较一帆风顺。1934年11月,她赴法国留学的第





五年,获得巴黎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36年11月,陈学昭与丈夫何穆去了南昌,以后又辗转九江、汉口,到了重庆。在重庆,她去了“红岩”,“红岩”办事处为她开了介绍信,她又去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再到延安。其时,孙起孟正在黄炎培办的《国讯》任总编辑,约她写关于延安的通讯,说黄炎培急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又发给了她一张《国讯》的特约记者证明书。1938年6月30日,她与何穆从重庆出发了。

1938年7月29日,陈学昭一行到了西安。由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在8月6日到了延安。在1939年8月,陈学昭与何穆曾回重庆,1940年10月再次出发去延安。自此,在延安一直住到抗战胜利后奉命进入东北。

在延安,陈学昭开始了她人生的转折期,也由此开始了她与中央领导人的交往。

成仿吾向朱德介绍说:“这是中国最老的一位女作家。”

在20年代初即已登上文坛,又留学法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陈学昭来到延安,是颇受重视的。她丈夫何穆则是医学博士,还带来了手提X光机以及其他一些医疗器材。他们在延安一开始就享受了团级干部所能有的“中灶”待遇。

在中央组织部,陈学昭会见了副部长李富春。李富春听取了她对工作安排的意見,要她“落户”在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至于在延安的采访,可以到他那里拿介绍信,随时可以进行。她开始了在延安的采访活动,曾去陕北公学采访了成仿吾,结识了这位创造社的老将。在成仿吾的窑洞里,她巧遇朱德总司令,这一天,朱德是应邀来陕北公学讲话的。成仿吾为朱德介绍陈学昭说:“这是中国最老的一位女作家。”这一说陈学昭可受不了了,只能说:“请你不要开玩笑。”成仿吾却是认真的,笑着说:“一点也不!”

她同朱德在随和的气氛中开始了谈话,又同陕北公学的学生一起听了朱德的报告。她感到,朱德是如此地受到青年人的爱戴,也使她有了像青年人见到久别重逢的父亲那样的况味。午饭前,朱德拿出了一个小本子要陈学昭题词。成仿吾笑了:“你也学会了这一套!”这使陈学昭感到延安领袖人物的亲和力。她在本子上写下了对朱德的崇敬之情:“抗日民族英雄朱总司令万岁!”陈学昭也拿出了她的本子请朱德题词,朱德问成仿吾:“写‘坚持华北抗日’,好不好?”成仿吾说:“好。”“要不要写日子?”朱德问陈学昭。她说:“随便的。”“好,那就不写了。”午饭时,她见到朱德已经吃了三碗饭。这时,大家说起了饭



量,朱德说:“我平常吃一碗半,有时吃两碗。”陈学昭笑了,像老朋友那样说:“你这是第三碗了。”朱德惊讶了:“呀,我添过两次了?”第一次接触,陈学昭就被朱德那种气质折服了。

陈学昭访问了毛泽东:“如果西安一旦不幸失守,延安与西南的交通阻隔了,受到封锁,粮食发生问题,怎么办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有办法,靠老百姓……我们还可以打游击。”毛泽东又介绍她去访问李六如,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前线作战情况。那时,李六如是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

陈学昭出席了1942年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在留下的那张与会者的合影里,在毛泽东左后侧的就是陈学昭。

之后,陈学昭去中央党校四部任教员时,又见到了毛泽东。四部学员都是团以上干部,因久经战争,文化水平偏低。为增强学员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学员们的学习效率,她改进了教学方法,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毛泽东知道了,在见到她时特意表扬:“又是文学家,又是教育家。”

在延安的前一阶段,陈学昭主要是边采访边写作。每次采访前,都去李富春那里开介绍信,每写完一篇,就送交李富春阅看。她就同李富春极熟悉了。同李富春一熟悉,李富春也会婉转地批评她。她在李富春、蔡畅面前也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她用法国人的习气说反话讽刺人,李富春就多次规劝她:“不要说倒话,别人会以为是真的。”一次,陈学昭说起有的部门对待某人的不公,李富春说:“要不是遇上共产党,你这个人是会做绿林好汉的。”

周恩来:“(你)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私生活。”

1939年夏末,陈学昭在一篇篇地写延安访问记。一天,她走出窑洞去散散心,休息一下,见到周恩来也在散步。那时,周恩来因骑马跌伤了右臂,正在接受治疗、休养,就住在她隔壁的窑洞里。

周恩来先向陈学昭打招呼,问:“写得怎么样了?”陈学昭感到奇怪,周恩来怎么知道她在写作的,只是回答说:“写得很慢,一天才写几百字。”初次见面,寒暄了一番。过了几天,周恩来的警卫员来了,递给她一个茶缸,说是周副主席送来给她尝尝的。陈学昭看到,茶缸里是大白菜打底,上面有两个红烧狮子头。事后,她知道了,周恩来做的狮子头是他家乡的淮扬菜。1942年夏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自重庆回来,约陈学昭到他们的窑洞,邓颖超交给她茅盾夫人孔德沚托带的白糖、巧克力,以及给她女儿亚男的一辆自动玩具小汽车。这





时,陈学昭已与何穆离婚。她想起,在爱国女学读书时,就结识了一位同学的弟弟季志仁,当时季志仁在震旦大学读医科预科。她去法国留学时,季志仁也正在法国读书,在这里她又结识了蔡元培的儿子蔡伯龄。他们两人是在陈学昭的记忆里留了一辈子的。但是他们中的哪一个都没有成为她的丈夫,而是何穆乘病而死缠着她,博得了同情——这造成了她人生旅途的一大波折。当初在法国准备结婚时,周建人知道她是考虑到何穆当时有病,以为结合在一起对他可以有所照顾,曾来信说:“结婚是有关一生的大事,不能为了对方生病而作此考虑的。”但周建人的信来得太迟了。周恩来知道她的婚姻情况,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事,就是这件事做错了,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私生活。你年轻时不识人!要识人啊!”陈学昭事后多次想到这句话,但心性直爽的她,还总是吃这个方面的亏,容易被别人一时的表现所迷惑。这时,周恩来见她眼睛已是红红的了,说:“好了,不要再去想了!今天请你吃杏仁炒鸡丁。”陈学昭惊讶了:在延安,哪有什么杏仁啊?周恩来下厨了,端上来“杏仁炒鸡丁”,原来是用鲜玉米粒加鸡丁炒的。她知道周恩来会炒菜,这次又品尝了周恩来的手艺。

以后,周恩来、邓颖超每次自重庆回延安,总要带点书给她,有《飘》《简爱》,等等。直到晚年,她还保存着周恩来在重庆时托人送她的一个布制胃托,那是周恩来得知她得了胃下垂的病后专门托人从香港买来的。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这份真心关爱,陈学昭是有深切体会的。在1942年后,写工农兵成为时尚,她也想下乡,周恩来恰在这时回延安,听了陈学昭的想法,说:“留在延安,写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的,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为人民所需要的。”受到启示,陈学昭终于写出了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工作着是美丽的》。这是在解放区出版的第一本写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

历经两次误会:准备“远走低飞”回老家。

1942年秋冬时分,陈学昭被调动到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工作,任四版即综合版编辑。其时,有多位领导找陈学昭谈过,希望她参加中国共产党,只要她提出入党申请,就可得到批准,且无候补期。可见,陈学昭的思想与为人已经得到了领导与群众的赞许,她一贯追求真理与正义的历史也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1945年7月,她由中央党校四部主任张邦英和组织科长李天焕介绍,参加了共产党。不多久,就迎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也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的通知,中央决定派她从东北出国,经苏联去巴黎,参加国际





民主妇联的工作。陈学昭想到,这一工作安排可能并不是临时决定的,因为早在两年前,周恩来就对她说过“你将来的工作岗位在国外”。现在国际形势大变,是到了去国外工作的时候了。她也想到中央领导人的深谋远虑:在前几年形势特别困难的时候,就已经在谋划抗战胜利后的国际交往了。

1945年10月,陈学昭随去东北的人员出发,历时数月才到达东北。中间因战争形势的变化,又回过延安,但最终还是到了东北。一路行程,一路创作,从《东北日报》上可以看到她的不少作品。1946年10月,她的作品结集为《漫走解放区》,由牡丹江书店出版了。可惜的是,牡丹江书店在长春所印的1万本书,除陈学昭自己拿到的一些样书和书店带出的几百本外,其余的书在八九天后就毁于战火了。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是在1949年12月由上海出版公司重排的版本。因此,在现今的一些文学家辞典中,都未列有牡丹江书店出版的这本书,而把上海出版的当成了初版本。

进入了平山县的西柏坡,她要去中央组织部报到。在路途中,后面来了一辆吉普车,陈学昭正要让路,车停了,车上走下了刘少奇。“你刚到么?要去哪里?”得知她要去中组部,刘少奇笑着说:“好,我送你去!”陈学昭想到过去见到刘少奇的情景,他是相当平易近人的,见了她,就语带笑意:“解放了的人,漫走在解放区。”她意识到,刘少奇对她的创作是熟知的。

也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为出国,中组部通知她同参加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一起去东北。在石家庄住了几天,闲来无事,她就上街买书去了,买到了一些法文版的《复活》《浮士德》等。见到有卖烘山芋的,好几年不见了,买了两个带回招待所。她分了一个给同室住的那位陕北女劳模李凤莲,被拒绝了。此后,这位女劳模向带队的人作了汇报:陈学昭整天跑旧书店,看外文书,还买烤山芋吃。带队的同志找陈学昭谈了,说是知道了就行了,用不着计较。但陈学昭还是心潮难平:是不是只能看马列的书呢?实在想不通。吃个烘山芋也是资产阶级思想?那路边买个烘山芋边走边吃的可大多是劳动人民。

另一种不被人理解却彻底改变了她今后的人生道路。在哈尔滨,她接到通知,组织上决定要她第二天同刘宁一一起动身出国。这天她在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了,是东北局组织部秘书长李之珽来通知她,组织上要重新考虑决定,她明天不出国了。事后才知道,是东北局常委李立三提出了非议,认为陈学昭去法国是为了找蔡元培之子蔡伯龄,他们过去是好朋友。尽管东北局多数常委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见,但在李立三的支持下多数却服从了少数。李立



三从苏联回国不久,又何来这一意见呢?原来他是轻信了一位女作家草明的反映,说陈学昭出国是去找对象的。陈学昭和草明都已去世了,草明为什么要作这一不符合事实的汇报,只有留待后人去分析,这里就不便妄加议论了。

陈学昭留在了东北,她参加了东北第一次妇代会的筹备工作。之后,进入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妇代会主席团的工作,又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彭真曾派他的秘书来看望她,问她有什么事要办,有什么问题可以协助解决。陈学昭决定“远走低飞”,准备回浙江老家工作。

李伯钊:“陈毅、聂荣臻要你随我们回北京疗养。”

陈学昭同江丰、莫朴在1949年8月同车到了她已阔别十余年的家乡浙江,进入杭州。她出席了浙江日报社为她举行的欢迎座谈会。至今还有人对她当年的风度难以忘怀:她穿着一身布军装,戴着顶布军帽,温文尔雅,又庄重,又谦和,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更找不出一星半点留过洋的影子,完全是一个质朴的女兵。

应该说,在浙江省的最初几年,陈学昭的心情是愉快的。那时,省委的主要领导谭震林、谭启龙对文化人是相当重视的,来杭州后近三个月,她被安排到马寅初任校长的浙江大学任党支部书记,并在中文系任教,开设了文艺理论与写作两门课程。1950年夏,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她被派到家乡海宁县参加土地改革,历时半年有余,以所取得的素材,创作了16万字的中篇小说《土地》。1951年,她出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同年,任浙江省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

陈学昭不想长期住在城里,她的性格决定了她是要潜入到生活中去的。1952年,她到杭州郊区的茶乡龙井体验生活。在茶乡的奔波,使她在从陕北往东北行军途中得的病症又复发了。但是,她仍然坚持着。刚过清明的一天午前,她正在房间里写笔记,突然,茶场来人有人说有人找她。她去了茶室,见到陈毅、聂荣臻、李伯钊三人正坐着喝茶。陈毅快人快语,一见到陈学昭就向她要她写的《土地》。陈学昭当即回到自己的住处取来了仅存的一本,递给了陈毅。陈毅拿到书就专心看起来了。聂荣臻问她关于茶乡的事,也问她的生活状况,他们都是早就互相熟悉的,可以用相谈甚欢来形容这次会见了。他们邀陈学昭同去省军区招待所吃了午饭,又用车把她送到作为省委招待所的新新饭店午休。之后,李伯钊来了,转告了陈毅的意见,要她随他们一起去北京疗养:“你病得这样,怎么还能在龙井?”陈学昭只是笑着:“很快就会好的。”李伯钊



不以为然：“你连腰都直不起来，还能山上山下跑？准备一下行李吧，明天一道坐车去北京。”说完，拉她一起去陈毅、聂荣臻处吃了晚饭。尽管陈毅、聂荣臻再次劝她回北京疗养，但陈学昭还是决定留在杭州，留在茶乡。如果她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就此去了北京，可能后半生的岁月就会是另一种样子吧！毕竟有那么多了解她、关心她的中央领导人；何况，她的档案始终在中央组织部，并没有转到浙江来。

在茶乡的收获，是她了解了茶农的生活，也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春茶》，这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陈学昭：“这样的会，我拒绝参加。”

每次去北京，陈学昭总要去看望周恩来、邓颖超。1953年9月，她去北京出席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也去了周恩来家。周恩来知道她在茶乡深入生活，就问起了那里的情况。陈学昭如实汇报了：“公家要办茶场，这是好的，但不能圈茶园，这不要影响茶农的生活么？公家办茶场，是可以去荒山另辟茶园的。”周恩来肯定了她的意见。11月，她与许广平、杨之华、李贞等组成中国妇女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回杭州后，从茶农处得知，公家茶场占用茶农的茶园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她又一次感受到了周恩来的工作作风，但是在当地，她是不是因此触犯了某些人呢？

1955年6月，陈学昭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学习，突然接到通知，要她去参加批判丁玲宣扬“一本书主义”的大会。会上，她那学习小组的组长第一个上台发言了，说是陈学昭揭发的，丁玲宣扬“一本书主义”。接着就是一个一个地批判了，陈学昭几次要站起来发言，都被阻止了。她终于忍不住，也不管台上的人正在讲话，站起来说：“丁玲同志没有讲过、也没有倡导过‘一本书主义’。”她说出了事实真相，是那位小组长前两天找她，问：“丁玲同你这么要好，你们平常谈些什么？”陈学昭答：“她忙她的，我忙我的，没谈什么。”又问：“你好好想想，你不讲，对你没有好处！”这是带有威胁性的语言了。过了一天，小组长又找她，陈学昭说：“我忙着自己的创作。丁玲说，白朗已写出一本，草明写出了一本，她自己也写出了一本。”事情就是这样，怎么能说丁玲宣扬一本书主义呢？陈学昭讲明了事实，申明：“这样的会，我拒绝参加。”说完，就走出了会场。

终于有了机会暂时脱离这是非的漩涡。这年9月，她接到领导通知，要她



接待法国作家萨特和波波娃。而今，萨特的著作和波波娃的《第二性——女人》在中国已发行甚广。当时陈学昭接待这两位作家的心情也是愉快的，毕竟多年没有接待过法国友人了。她想起在法国留学时，为了一睹居里夫人的风采，她还专门去听了她的一堂课，还曾写过一篇通讯寄回国内。

陈学昭陪萨特和波波娃访问了老舍和丁玲，再去广州，又到武汉、杭州转了一圈之后，再到北京，参加了国庆的国宴。他们的座位在毛泽东的邻桌，陈学昭领他们去见了毛泽东，也见了陈毅。

周恩来：“陈学昭为人耿直，批评一下就可以了。”

1957年，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人闻风而动，下令广大党员和群众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并要各部门、各单位举行各种座谈会，以让大家发言鸣放。其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与其夫人葛琴来杭州，认为陈学昭作为省文联的副主席要带好这个头。陈学昭没有准备在省文联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言，但在邵荃麟的一再劝说下，还是在会上讲了几句，其中有一句是“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反右一来，这发言成为了攻击省委、反对党的领导的罪证，连同她以前写的一些文章都被作为毒草批判了。

陈学昭回想起在东北时曾有人对她说过的话：“虽然有些揭发不经调查就被作为事实来认定了，但这是阶级斗争啊！”她当时不能理解阶级斗争为什么是这样的，现在是亲身经历了。

一切都在预先的设计之中，她被定为右派分子，《浙江日报》刊登了大块的批判文章，《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通稿以将她这右派分子告知全国乃至世界。随后，她被开除党籍，撤消了职务，也取消了一切待遇，连公费医疗也取消了，生活由所得稿费自给——不过作为右派分子，还有哪家报刊能刊登她的文章？她又从何得到稿费呢？

几年后，她才知道，周恩来曾经保护过她。

1962年元月，她被摘去右派帽子。1963年初夏，她接到通知去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的学习班。在北京，她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希望能会面。隔了一天，邓颖超打电话给她，约她在星期天早上见。进入国务院大门，邓颖超已在院子里的廊上等着了。一起到了周恩来家的会客室，两人紧紧地拥抱了。邓颖超说：“今后，同省委的关系搞好一点。”这话，又重复说了一遍。邓颖超是知



道问题的关键的,又表示歉意地说:“周恩来工作到今晨4点才睡的……”陈学昭说了这几年来的遭遇,这不是诉苦,而是在叙说对这遭遇的不理解,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变成了反党的右派分子。要离去了,邓颖超要了车子,说:“你去一下周扬家吧。”邓颖超的车子到了周扬家门口,她们告别了。

在周扬家,陈学昭看到了周扬和苏灵扬。周扬告诉她,在反右时,总理曾要他出面请浙江省委不要把陈学昭划成右派,说陈学昭为人耿直,想到什么说什么,并非出于恶意,批评一下就可以了。周扬为此写信、打电话,把这一意见转告了浙江省委有关领导。但是,这一努力没有奏效。浙江省委某领导人还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把陈学昭打成了右派。现在,陈学昭从周扬那里得知了周总理曾有过的保护措施,内心是极为感激的。她也理解了邓颖超的用意,要她去看望周扬,是要让周扬传递这一信息吧,也要她相信,中央有关领导人始终是关心她的。

以右派的戴罪之身,陈学昭于1957年冬被下放到绍兴。她曾经为大炼钢铁而去砸石煤,也曾为大办农业而去养猪。直到1960年才因病而蒙当权者恩准,调回杭州去杭州大学图书馆工作,也因副校长林淡秋的积极性,恢复了公费医疗待遇和粮食供应。林淡秋自己就是文化人,30年代曾是左联常委,又曾是《人民日报》副总编、文艺部主任,过去虽然没有同陈学昭一起工作过,但对她还是十分了解的。1965年初,陈学昭给邓颖超写信报告自己的近况,邓颖超要秘书代笔回信,仍是勉励有加,要她尽快争取回到党内。但是,全国不久就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陈学昭陷入了更大的灾难中。这灾难,是可以想见的,这里不说也罢。一次,路遇方令孺,陈学昭对方令孺说:“不管怎样,要活下去!活下去!”她坚信这样的日子一定会过去。

她的档案在中央组织部。造反派想去查阅,被中组部的人员断然拒绝了。造反派去找周总理外调,邓颖超接待了,说:“陈学昭有什么问题?”造反派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陈云寄赠条幅:“周公恐惧流言日……”

她终于见到了“四人帮”的覆灭。1977年春,就有报刊来向陈学昭约稿。虽然如此,浙江省委为她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是1979年2月的事了。这22年,陈学昭在坎坷的生活中依然没有完全停笔。无处发表,那就暂时保存着。因而,在拨乱反正之后,上、下两卷的《春茶》合印版在1979年出版





了,上、下两卷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合印版也在1979年出版了,文学回忆录《天涯归客》《浮沉杂忆》相继在1979年、1981年出版。现在,创作的热情是更高了,散文集《野花与蔓草》《难忘的年月》《蔓草拾零》《如水年华》《心声散曲》《心声寄语》等一本本出版了,这是她在七十余岁高龄时写出的。

在陈学昭生命的最后几年,尽管腰椎骨质增生,又有严重的糖尿病,连吃药也得用小刀把药丸外面的糖衣刮掉才能服用,但是她仍然坚持着每天写几百字。

尽管已经平反了,但直到1979年5月陈学昭才离开杭州大学图书馆而将人事关系转到省文联。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碎了,但在那里还是上演了一出闹剧。

那是在1983年8月,一位好心人告诉陈学昭一个消息:杭州大学图书馆还有人在整理她在“文革”中的材料。毕竟不是那个年月了,人民日报社得知此事,在12月5日的《今日谈》栏目里发表了《还想算帐吗?》,对那卑劣者的用心作了揭露。丁玲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即提笔写了《致学昭同志》,刊登在1983年的《新观察》第24期上。丁玲的愤慨是溢于言表的:“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想干什么呢?还想秋后算帐,还想置革命同志于死地。对这种人,我们还要讲人道主义?讲人性论?和嗜血的人手拉手?不能!不能!”丁玲又写道:“学昭同志!你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只是你的一个普通读者。你那时大约只有十七八岁,而你的文章却写得那样清丽。”“你一开始就是具有较新的、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在我们抗战的艰苦年代,你勇敢地跑到延安来了,并且一直坚持到底。”丁玲在文章的最后说:“历史是公正的,严酷的,学昭同志,我挂念你的,还是你的健康。冬天来了,你的屋子是否有炉子取暖?望千万保重。”

1985年,陈学昭80寿辰。她收到了陈云寄来的条幅,写的是白居易的《放言》:“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陈云另写有一幅,是赠她女儿亚男的:“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这时,陈云也81岁了。陈云是知道亚男的,她1941年出生在延安,在延安保育院度过了童年时代,之后,随保育院撤离延安,辗转数千里,来到北平,进入育英小学上学。她的小学同学有罗瑞卿、荣高棠、博古、黄镇的女儿。

1979年,陈学昭曾去北京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京期间,她见到了邓颖超、彭真、康克清、李伯钊等人。这是她与这些老领导、老朋友们的最后一次



叙谈。她又去医院看望了茅盾,去了周建人家里,这也是她与两位老友的最后一次见面。

1991年10月10日,陈学昭去世,终年86岁。在去世前,她关照女儿亚男把骨灰撒入家乡的钱塘江中。她少年时离开家乡,于今,又魂归故里了。

邓颖超、陈云、彭真、巴金等发来了唁电。这些中国革命史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代表人物的唁电,是对陈学昭在这两个“史”中所作出贡献的充分肯定。

陈学昭可以安息了。

(原载于《世纪》2003年第2期)